

# 钝化刀锋：中国改革以来的区域经济发展

都 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和劳动力经济研究所）

Albert Park

（密歇根大学经济系）

工作论文系列四十九

Working Paper Series No.49

2005年9月

# 钝化刀锋：中国改革以来的区域经济发展\*

都 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和劳动力经济研究所）

Albert Park

（密歇根大学经济系）

## 摘要

Alwyn Young（2000）认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国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下降。本文针对这一观点及 Young 所提出的经验证据进行了讨论。Alwyn Young 陈述了三个主要的实证结果：经济产出的省际结构收敛于 1993 年；如果市场更加一体化，区域间的价格差别并没有像期望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小；农业劳动力配置也并没有实现符合比较优势的转变。

本文的研究表明，当控制与每个省的增长相关联的经济结构时，地区专业化的增长实际上从 80 年代早期就开始了。我们认为用价格差别的扩大来衡量市场一体化程度是不合适的，因为价格差别的增加实际上可能反映的是国内贸易增加所产生的运输拥挤所致，还可能是由于政府在改革初期广泛地实行低价格政策，从而导致各地的价格具有较小的差异性。最后，我们的研究表明，由于 Young 使用的数据不准确，以及加总的程度太高，因而其关于农业劳动力边际回报的分析是有缺陷的。我们推断，Young 的分析对于“中国的国内市场在改革以来一体化程度反而下降”的说法几乎不能提供实证支持。

JEL Code R11 R12 O10

## 一、引言

中国的国内市场是越来越一体化？还是越来越分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市场化改革成败与否的判断，也涉及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能否得以延续。因此，最近有大量的文章，讨论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内市场一体化问题。在众多的文献中，Alwyn Young（2000）提出了一个煽动性的假说：中国国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至少到 1990 年代早期仍然如此。与 Alwyn Young 的观点类似，Poncet 在一系列文章中，用了不同的方法和数据，证明市场一体化程度降低的趋势一直延续到了 1990 年代后期（Batiss 和 Poncet, 2003; Poncet, 2002, 2003a, 2003b）。也有其他学者基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反驳了这个观点，并且提供了国内贸易增加和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的经验证据（Naughton, 1999; Xu, 2002; Bai 等人, 2003）。新近的佐证还包括都阳和蔡昉（2004）利用制造业工资数据观察到的劳动力市场区域一体化趋势，以及蔡昉等（2003）对中国地区之间专业化趋势的观察。

在一系列有关中国市场化程度的讨论中，本文的基本观点属于后一个群体。对 Young 的研究方法、数据和基本结论的重新评价，是本文的主要目的。Young 的研究阐述了三个主要的实证结果：到 1993 年，中国各个省份之间的产出结构表现出趋同的趋势；如果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则区域间的价格差异会随时间变化而缩小，但中国的情形并非如此；农业中劳动力配置的变化并没有按照符合比较优势方向变化。我们对这三个结论分别进行了评估，并且推断 Young 所提出的“中国国内市场在改革以来一体化程度降低”的说法无法获得实证结果的支持。但是，Young 的论文倒

---

\*黄季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部分的研究数据，作者在此表示感谢。

是为我们就中国改革及其市场化程度问题展开讨论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希望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从而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接近事实的本来面目。

## 二、经济结构的收敛

Young 对中国市场一体化程度变化的讨论首先从区域间经济结构的变化开始。他用各省三次产业的产出份额来表示各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并发现各省的经济结构在改革以来的大多数时间内是收敛的。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省份的生产结构看起来越来越相似。他将省内和全国的 GDP 分成了初级产业（农业），第二产业（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和公用事业），第三产业（服务业）等三个部门。然后计算每年的区域专业化指数（S），其公式如下：

$$S = \frac{1}{nJ} \sum_{i=1}^n \sum_{j=1}^J |S_{ij} - S_{ic}| \quad (1)$$

这里， $S_{ij}$  是第 J 个省份的第 i 个部门的产出， $S_{ic}$  是第 i 个部门在全国的产出中所占的份额，n 和 J 分别是部门和省份的个数。该指数实际上度量的是各省的部门产出份额偏离全国份额的平均离差，而全国的产出份额由各省和各部门间产出份额所计算出得来。图 1 再现了 Young 的结果，并且将时间延伸到 1998 年。Young 的结论是：从计划经济时期到改革期间（至少到 1993 年），根据上述方法所计算出的区域专业化指数存在着系统性的下降的趋势。



图 1 中国区域专业化指数 (Young) 的变化趋势 1952-199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年）计算。

关于图 1 所展现的区域经济结构变动趋势，有一点必须考虑，却为 Young 所忽略：区域专业化和多样化的趋势可能取决于其他因素，而非仅仅市场一体化。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假设若干没有变化的经济体，有着不同禀赋和相同的技术和偏好，各个经济体之间先无法产生贸易，随后贸易成为可能。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根据贸易理论可以做出很明确的推断，即贸易越自由，区域专业化的趋势越深化。但在现实世界中，很多情况都会发生变化。

首先，即便是计划经济，也并不等同于完全没有贸易的经济体制，因为计划者可以根据特定产品的生产安排区域性的专业化。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曾经在内陆省份有大量的工业建设投资，因此，相对于自由贸易体制，计划经济时期各个地区的专业化程度的起始点到底在何处，

就无法明晰。

其次，正如 Kim (1995) 所提出的假说，区域专业化可能取决于影响规模经济的技术变迁。Kim 发现从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中期，美国工业部门的区域专业化程度首先上升，然后下降。Young 也注意到，尽管美国的市场开放程度很高，但是美国的区域专业化程度在近几十年里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解释中国相似的情形时要十分谨慎。

第三，多样化的阶段与经济水平的不同水平是相互联系的 (Imbs 和 Wacziarg, 2003)。在各国发展的经济发展历程中，他们首先表现出产业的多样化，即经济活动在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均等分布，然后再实现经济的专业化。中国的许多省份仍然较为贫困，他们应该处于经济多样化阶段，这就很可能降低全国的区域专业化程度。

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增长迅猛的国家，我们将发现上述第三个问题特别重要。为此，我们对 Young 的专业化指数作了调整，以考虑与每个省的经济水平相联系的经济结构的预期变化。首先，我们将各省的部门份额对人均 GDP 的对数回归，通过省固定效果控制不可观测因素对各个省的产出结构所产生的系统影响，回归方程如 (2) 式所示。

$$S_{ijt} = \alpha_i + \beta_i \text{GDPPC}_{jt} + \sum_{j=2}^J \delta_{ij} + \varepsilon_{ijt} \quad (2)$$

GDPPC 代表人均 GDP。根据所估计的参数，我们可以计算每年各省各个产业的产出份额的预测值， $\hat{S}_{ijt}$ 。我们并不分析各省各产业的实际份额和全国的实际份额之间的差异，而是比较每年各省各产业的实际份额和各省各产业预测份额之间的差异：

$$S^* = \frac{1}{nJ} \sum_{i=1}^n \sum_{j=1}^J |S_{ij} - \hat{S}_{ij}| \quad (3)$$

$S^*$  度量了各省的实际产出偏离各省给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可观测的固定因素下，所预期应达到的专业化程度。我们也将各省和各部门的离差值加总起来，从而计算出经过调整的区域专业化指数，结果如图 2 所示。我们的结果和 Young 的结果有显著的不同。我们的结果表明，尽管在计划经济时期区域专业化程度不断下降，但从 1980 年代早期开始的改革时期，区域专业化程度有明显的提高。Young 还采取了其他的度量方式，如离差平方之和，来反映专业化趋势的变化。我们也根据 (2) 式的回归结果，重新计算了同样的调整指标，其趋势与  $S^*$  一致<sup>1</sup>。

<sup>1</sup> Imbs and Wacziarg (2003) 也发现，即便在将经济部门定义在更低的加总水平上，经济结构的多样性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也存在着 U 型的关系。因此，对更细分类的行业进行分析，以检验调整的区域专业化指数是否存在类似的趋势，将会是非常有意义的课题。这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内容。此外，我们还将以更灵活的设定式检验部门份额和 GDP 之间的关系，以观察我们的结果是否稳健 (robust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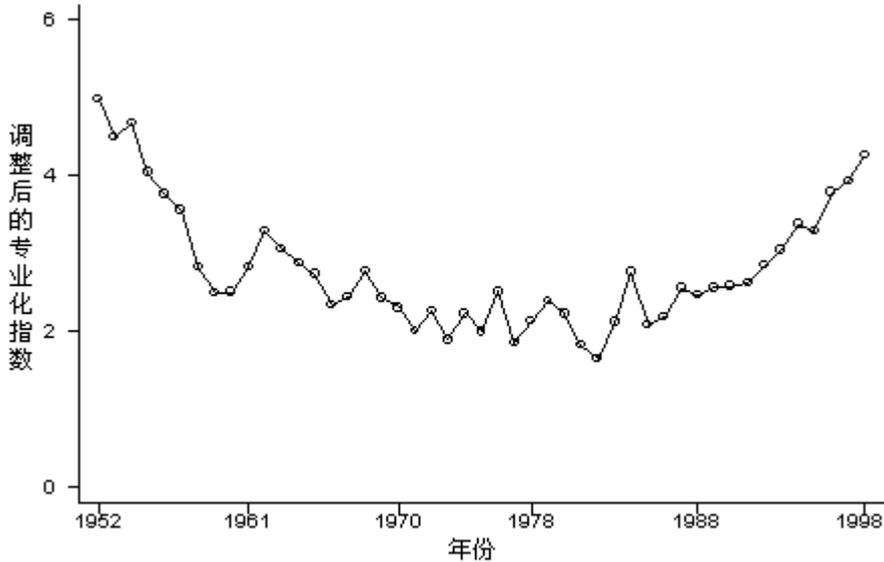


图 2 控制各省 GDP 和固定效果后的调整的区域专业化指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年）计算。

一个需要指出的问题是，我们在计算区域专业化指数时假定 GDP 是一个外生的变量，但实际上 GDP 往往受到省内很多不断变化的因素的影响，贸易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就经济发展水平反映特定需求结构的程度而言，即便是省际间存在不断变化的贸易水平，控制固定效果的影响是首要问题。

### 三、区域价格一体化

一般来说，区域间的价格关系及其变化趋势，是理解区域间市场一体化的重要角度。尽管这种分析方法在一般意义上，具有较大的价值，但在运用到转型经济的具体实践时，也需要考虑其制度特征变化所引起的复杂性。如果不对具体的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同样会犯类似于 Young 在讨论“区域专业化结构和经济收敛关系”时的判断错误。考察区域间价格关系的变动，是 Young 论证中国市场一体化程度下降的又一重要佐证。以下，我们简要分析一下其分析过程的欠缺。

通过描绘地区间价格的变动情况，Young 认为 1987 到 1999 年间，工业投入品和农产品的区域价格差异并没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区域间价格差异的变动模式与逐步一体化的市场所应该具备的模式不一致：因为在越来越一体化的市场上，人们将预期区域间的价格差异逐步缩小。据此，他认为区域间价格关系的变动趋势也说明了中国的国内市场是日益分割的。

在此，我们几点理由再次质疑其仅仅根据表面的价格差异，就简单将中国国内市场解释为地区间日益分割的市场。首先，我们重申上面提及的观点，区域价格差别的起点并不是一个没有贸易的市场均衡，相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差异是由于泛区域的价格形成机制所决定的，通常是地区间的成本差异确立一个并不适当的补贴。尤其是工业原料，在改革初期，即便报告为市场价格，但所度量的价格往往受计划的影响。农产品价格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分析地区之间的价格关系时还需要知道，价格是如何收集的，这样才能更恰当地使用相关的分析工具，并得出合理的结论。

其次，由于经济在改革以后的快速增长，以及地区之间贸易数量和人口流动数量的迅速增加，中国在改革后的很多时期都存在着很大的运输瓶颈。特别是在 90 年代早期，对铁路的货运需求远超过运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没有任何明确的地区性市场保护政策，运输成本仍然会增加，并会拉大价格的差异。实际上，这种情况反映的是区域间贸易活动的增加，而不是减少。某种程度

上来说，交通运输的拥挤也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问题，因为它是由交通运输行业的价格改革不充分所致。而地区之间贸易量的扩大，则可以看作是区域之间的市场正在逐步形成的证据。

无论怎么说，Young 自己也承认，区域间价格差异的逐渐下降，并不必然意味着市场功能没有发挥。实际上，就农产品而言，有证据表明，即便是在交易成本波动的时候，市场也在逐步深化，而贸易限制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表现会出现不平衡（Park 等人，2002）。另一方面，都阳和蔡昉（2004）利用制造业分细行业的工资数据发现，自 19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地区间工资存在逐步收敛的趋势，也表明区域间的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着一体化的过程。因此，要考证某个市场的价格变动关系，必须深入理解其政策和制度背景，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区域间价格变化的原因。而 Young 的分析结果只抓住了问题的表象，使其分析失去意义。

#### 四、劳动生产率、农业和气候

在其文章的最后一部分，Young 列举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区域间变化，试图说明区域间的要素配置没有遵循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所预期的方向，并进一步将其解释为区域间市场扭曲的结果。为了更好地说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们在此先简单介绍一下 Young 的几个主要观点。首先，Young 列举的证据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劳动力配置的相对比率以及两个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在区域间的变化在增加而不是减少。Young 之所以将这种现象看作是市场分割的证据，是因为如果地区的比较优势趋同，则就会出现地区的专业化程度下降的局面。此外，相对劳动力配置和相对劳动生产率应呈现出负相关关系。第二，Young 认为，1978 年省际的谷物单产和每公顷用工数量劳动力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符合比较优势的一般原则，但到了 1997 年二者已无相关关系，这也就意味着产出较低的地区每亩用工的数量减少的速度较之高产出地区慢。而如果是根据市场机制来配置劳动力，单产低的地区由于农业不具备比较优势，应该更快地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此外，通过回归分析，Young 发现劳动力和农机数量对产量并没有显著的作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条件更优越的省份更趋向于减少农业的投入。

Young 关于劳动力配置和劳动生产率的分析有一个主要缺陷在于，他所使用的分省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加总存量数据。众所周知，这些数据高估了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而低估了在其他部门的劳动力数量，这是因为农村居民从事非农产业的大部分时间没有被考虑在内。Rawski 和 Mead（1998）认为这一偏差可能是相当可观。另外，有的学者（Rozelle et. al, 1997）使用类似的劳动力存量数据估计农业生产函数，则发现劳动投入变量经常不显著或者系数为负，其结果和 Young 的结果却非常相近。但是如果在农业生产函数中使用更加具体的劳动力投入的信息，例如投入的工时数或者天数，那么劳动的估计系数通常都是正的而且显著。

Young 就农业生产函数所进行的分析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加总偏差所导致的。在改革期间，谷物生产的构成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因此，将谷物总产出与农业劳动力供给存量结合起来分析，将是产生估计偏差的来源。Young 也用人均谷物产出来代替农业生产率，但是更可取的测度指标是人均净产值，因为人均净产值反映了农作物的经济价值，并控制了其他投入成本对产出的影响。

为重新评价 Young 的实证研究结果，我们使用各年度分省、分谷物的农本调查数据。数据来源于农业部每年在大多数省份进行的农业投入、产量调查，该调查对不同作物的不同耕作期用工和其他投入情况都进行测度。产量调查是根据地块随机抽样的。如果我们知道了平均每单位土地上某种作物平均用工投入，以及该省该作物的播种面积，那么只要简单地将二者相乘，就可以计算出该种农作物的用工投入量<sup>2</sup>。

以下我们分析大豆、小麦和玉米三种作物的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生产这几种作物的地区比较广泛，数据的时间和空间跨度也较大<sup>3</sup>。Young 描绘了谷物产量对数和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对

<sup>2</sup>通过加总作物用工和畜牧业用工，则可以计算出一个省的总的农业劳动投入(Rawski and Mead, 1998)。

<sup>3</sup>如果使用水稻的数据，则会有一些问题，因为水稻有很多个品种，且生产过程有明显不同，而且很多地区每年的水稻生产超过一季。

数，与他所做的图类似，我们先作出每亩净产值对数和每亩用工对数的散点图，并将我们所掌握的数据的开始年份和最近年份（1978-80年以及2000年）的情况加以对比<sup>4</sup>。这一系列的散点图有效地规避了我们刚才提及的 Young 的分析中所存在的诸多不足。以下我们逐个分析一下这三种作物的情况。

首先，我们发现大豆在2000年的劳动投入和净产值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要比1978年强很多。如图3所示，1978年14个生产大豆的省份，每亩用工的对数集中于0.8到1.4之间，而每亩净产值的对数集中于1.1至1.6的区间内。而且，劳动力投入和产出之间几乎不存在相关关系。值得关注的是，同样是这14个省份，到了2000年，大豆生产的劳动投入和产出水平都有了显著的增加，每亩用工的对数位于3.0到3.4之间，而每亩净产值的对数集中于2.6至3.6的区间内。劳动投入对产出的反应也得以体现，在2000年散点图中，我们可以明显地观察到产出和劳动投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关于大豆所得到的比较明显的变化结果，反映出近年来大豆的全国性市场正在形成，而且非常活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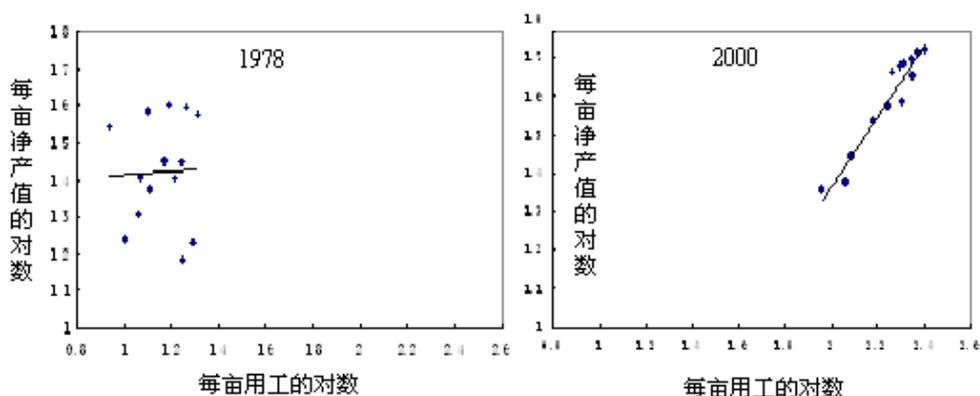


图3 大豆每亩净增加值和每亩劳动力（14个省份）

而对于小麦，在转型时期的开始和结束阶段的有相似的正相关关系：1979年（我们使用的数据的最早年份）时散点图的斜率和2000年时的斜率基本相当，如图4所示。因此，小麦生产的地区专业化程度似乎在改革初期已经比较高，相应地，即便是经济市场化，提高专业化的余地也就更小。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映证了前述观点：计划经济也可能产生专业化的分工，表现在农业部门，不同的农作物的专业水平也可能存在差异。从劳动投入看，小麦的每亩用工数量有明显的减少，21个小麦生产省份1979年的每亩用工对数为0.8至1.6，到2000年则减少为0.3至1.3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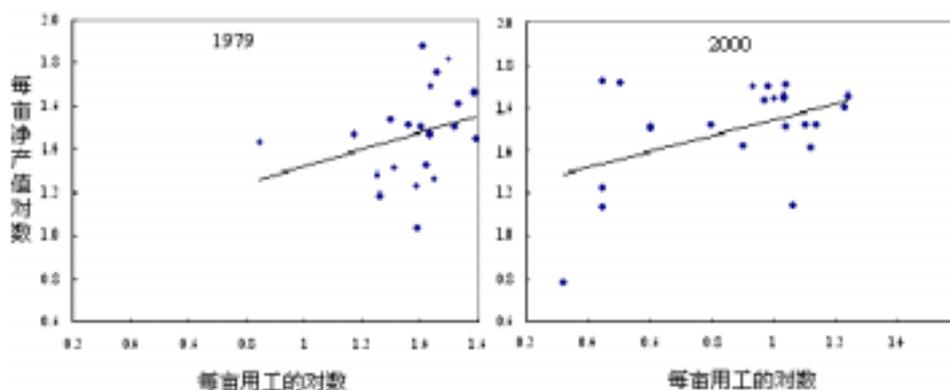


图4 小麦每亩净增加值和每亩劳动力（21个省份）

<sup>4</sup>不同年份的作物投入产出图使用的是相同省份的数据。

而对玉米来说，我们发现了和 Young 的结果比较类似的形状，如图 5 所示。虽然 1980 年的斜率受到了少数奇异值的高度影响，但 1980 年时是正的相关关系，而在 2000 年斜率基本是 0。不过，如果考虑到 1980 年的散点图绘制出的斜率明显受到了奇异值的影响，那么改革之初和 2000 年，玉米单位净产值和每亩用工数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相近的。20 个生产玉米的省份中，劳动投入的数量有明显的下降，每亩用工对数从 1980 年的 1.1 至 1.6，2000 年下降到 0.5 至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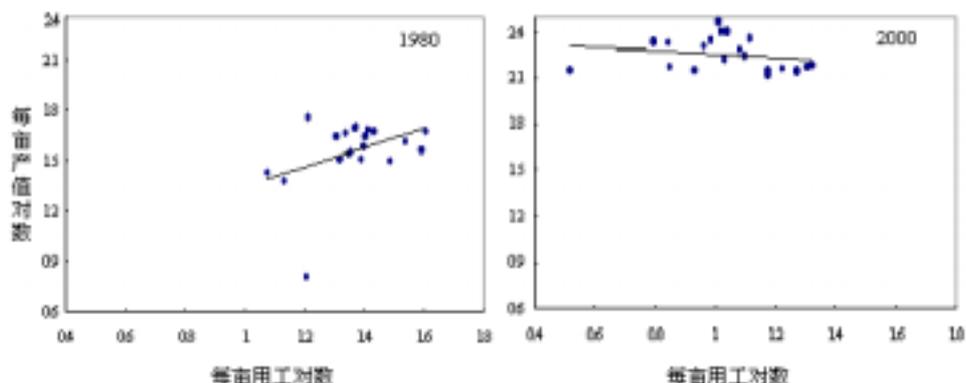


图 5 玉米每亩净增加值和每亩劳动力（20 个省份）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玉米和小麦的投入产出关系，以及劳动投入的下降。首先，种植业内部也存在专业化趋势，因此，劳动投入数量在不同的作物之间此消彼涨，这本身就是经济专业化程度的表现（蔡昉等，2003）。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观察到大豆的每亩投入时间大幅度增加，而玉米和小麦的劳动投入明显减少的原因。其次，相对于大豆的生产和经营而言，小麦和玉米更多地受到政策的干预。但即便如此，这两种作物的区域间贸易数量仍然在不断增加(Park et al., 2002)。

总而言之，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尽管仍然受到较高的交易成本和部分贸易壁垒的影响，但区域间的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尤其要指出的是，当我们使用信息更加具体的数据来重新评判 Young 的结论的时候，Young 试图展示很明确和典型的事实，其实并不存在。

接下来，我们利用不同的数据，重新回归 Young 所估计的生产函数和投入品需求函数。我们先来观察农业生产函数的情况（见表 1）。回归结果显示，大豆的生产函数中劳动力系数显著为正，而小麦的劳动力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玉米的劳动力系数为负，但估计系数的数值较小且不显著。这一结果和前面散点图所展现出的特点是一致的：即我们对三种作物的分析结果虽然未显示出同样的方向，但我们并未发现 Young 所展示的结果——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和产出水平是负相关的。而后者正是其判断市场分割的重要依据之一。

表 1 大豆、小麦和玉米产量的决定因素

	大豆	小麦	玉米
年份	.017 (2.20)	.019(4.14)	.026 (4.48)
种子	.010 (.13)	.072(1.61)	.046 (1.26)
化肥	.057 (2.67)	.035(2.10)	.051(2.65)
劳动力	.26 (3.02)	.052(1.20)	-.0054 (.08)
灌溉	.054 (.42)	.22(2.39)	-.073 (.74)
机械动力	-.064 (.49)	.024(.31)	-.088 (.80)
降雨量	.034 (1.44)	-.014(.96)	.035 (1.83)
降雨量的平方	-.001 (.80)	-.00016(.21)	-.0015 (1.35)
降雨量的变异系数	-.00076 (.01)	-.060(1.62)	-.12 (2.58)
R <sup>2</sup>	.19	.55	.25
观测样本数	207	306	265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

我们再分析一下三种作物的投入品需求函数的情况，回归结果见表 2。除了玉米之外，我们并没有观察到 Young 所发现的气候变量对产出的显著贡献。在估计化肥和劳动力的投入需求函数时，我们也像 Young 一样分别估计加入虚拟变量和不加虚拟变量的方程。我们来看一看方程中包含省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在小麦和大豆生产的化肥需求函数中，天气和时间的交叉项显著为负；但在玉米生产的化肥和劳动力投入需求函数中，交叉项不显著；大豆的劳动力需求函数中交叉项也不显著。因此，这三种谷物都没有体现出更优越的自然条件会明显的影响产出，又明显地减少投入。我们的结果比 Young 所报告的结果要弱很多。

表 2 化肥和劳动力需求的决定因素

	小麦		大豆		玉米	
	化肥	劳动力	化肥	劳动力	化肥	劳动力
考虑省份虚拟变量						
年份	-.073 (6.11)	.0008 (.18)	-.0097 (.39)	.0058 (.96)	-.077 (5.66)	-.0065 (1.65)
天气×时间	<b>-.68</b> <b>(2.62)</b>	<b>-.49</b> <b>(5.20)</b>	<b>-1.46</b> <b>(2.80)</b>	-.04 (.32)	-.081(.25)	-.0076 (.08)
R <sup>2</sup>	0.25	.004	.07	.064	.25	
不考虑省份虚拟变量						
年份	-.072 (4.41)	.0034 (.25)	-.006 (.17)	.012 (.89)	-.075 (5.05)	-.0046 (.41)
天气×时间	-.51 (1.45)	-.50 (1.70)	<b>-1.70</b> <b>(2.26)</b>	-.22 (.82)	-.12 (.33)	-.066 (.25)
天气	.60 (.24)	<b>8.02</b> <b>(3.96)</b>	<b>11.11</b> <b>(2.12)</b>	<b>13.60</b> <b>(7.22)</b>	-2.19 (.87)	<b>7.34 (3.85)</b>
R <sup>2</sup>	.25	.08	.11	.41	.25	.15
观测样本数	307	307	207	207	265	265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

当我们关注于农业时，发展中经济存在一些特殊的经验特征，而这些特征 Young 在解释他的数据时没有考虑。一个暗含的假设是：如果可以证明农业的要素市场不是区域一体化的，那么就可能得中国总体上处于保护主义的结论。首先，中国和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因为农业影响到食品安全，而降维护粮食安全通常作为重要的政治目标。这样，农业部门通常比别的经济部门受到政府的更多的干涉。虽然如此，还是可以观察到全中国的谷物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显著的深化和一体化 (Rozelle 等人, 1997, 2000; Park 等人, 2002)。其次，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可以观察到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工资或者是边际生产力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逐渐增大，但是城镇和非农业人口占据主导地位时，差异会降低。在美国，北方的工业化首先扩大了区域差距和工资差异，随后，南方的结构变化减小了区域不平等，并且降低了工资/生产率差异。这些部门间工资均等化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年时间来完成，而且劳动力市场通常是一体化进程最慢的市场(Williamson, 1990)。在中国，沿海地区以爆炸性的速度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但沿海地区内的农业和非农产业的生产力差别变大了，甚至像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这样的地区差异也有所扩大。沿海省份气候更优越，好且工业化进程很快。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力以更快的速度被大量的从内陆吸引到这些地区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当然反映了劳动市场的不完全，但在中国这种大的发展中国家，类似的不完全性即使在没有内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都会出现。

## 五、结论

Alwyn Young 认为，中国的国内市场由于贸易壁垒而更加分割，本文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初步的挑战。我们批评了其分析的每一部份的假设，并且提供了其他证据，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向研究这一问题。这些结果仍然是一些比较初步的分析，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我们将对更细致的分部门数据进行分析，以验证专业化趋势和经济多元化的关系。我们还将以更灵活的设定式检验部门份额和 GDP 之间的关系，以观察我们的结果是否稳健。

尽管如此，我们希望这篇简要的论述可以表明，评价中国的内部市场一体化进程是一项纷繁复杂的任务，因为迅速发展和经历结构变化的经济体的区域生产和专业化有着多种多样的，甚至

是复杂的结果。中国的情形之所以复杂，更因为中国同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转型国家，一个正在融入全球化的国家。只基于一个观点而不认真考虑这些易混淆的过程的实证评估结果很容易走向偏颇。

## 参考文献

- Bai, Chong-En, Yingzhan Du, Zhigang Tao, and Sarah Tong. 2004. "Local Protectionism and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Indus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3(2): 397-417.
- Batisse, Cecile, and Sandra Poncet. 2003. *Protectionism and Industry Localization in Chinese Provinces*, mimeo.
- Imbs, Jean, and Romain Wacziarg. 2003. "Stages of Diversifi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1): 63-86.
- Naughton, Barry. 1999. *How Much Can Regional Integration Do to Unify China's Markets?*, mimeo.
- Park, Albert, Hehui Jin, Scott Rozelle, and Jikun Huang. "Market Emergence and Transition: Transaction Costs, Arbitrage, and Autarky in China's Grain Market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84(1): 67-82, 2002.
- Poncet, Sandra. 2002. "A Fragmented China: Measure and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 *CERDI Etudes et Documents*.
- Poncet, Sandra. 2003a. *Domestic Market Fragment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mimeo.
- Poncet, Sandra. 2003b. "Measuring Chines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 Rawski, Thomas, and Robert Meade. 1998. "In Search of China's Phantom Farmers," *World Development* 26(5): 767-81.
- Rozelle, Scott, Albert Park, Hehui Jin, and Jikun Huang. "Bureaucrat to Entrepreneur: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State in China's Grain Econom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8(2): 227-252, 2000.
- Rozelle, Scott, Albert Park, Jikun Huang, and Hehui Jin. "Liberalization and Rural Market Integr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79(2): 635-642, 1997.
- Sonin, Konstantin. 2003. *Provincial Protectionism*.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557.
- The World Bank. 1994. *China: Internal Market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Williamson, Jeffrey. 1999. "Globalization and the Labor Market: Using History to Inform Policy," in Aghion, Philippe, and Jeffrey Williamson, *Growth, Inequality, and Globalization: Theory, History, and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03-199.
- Xu, Xinpeng. 2002. "Have the Chinese Provinces Become Integrated Under Reform,"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 116-133.
- Young, Alwyn. 2000. "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4): 1091-1135.
- 蔡昉、王德文、王美艳，《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地区专业化趋势》，《经济研究》，2002年第9期，第24—30页。
- 都阳、蔡昉（2004），《制造业工资趋同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世界经济》，2004年第8期。